

浮沉八十年（二）

華壽崧

京滬淪陷開始流亡

民國二十三年春天，余井塘先生接任江蘇省政府民政廳長，他向政校查詢，知道僅有我和邵步墀、鄭福三人服務上海市公安局，有些警政經驗，其實我們在上海祇工作了兩年，一點經驗都未得到，祇是閒員而已。他託人間接的寫信給我，要我去崑山考察警管區實施情形，並作報告，詳述利弊得失，分明是對我考驗一番。崑山距上海很近，我利用星期假日就到崑山訪問提倡警管區的一位分局員黃某，探詢實施的情形，並在鄉區一個警區跑了一轉，索取劃區標準以及警員手冊、查勤制度等等，回滬後寫了一份報告。大意是警管區制適用於江南社會安定的各縣，如在徐海匪區則不適宜，因為匪區必須集中警力，防禦土匪襲擊，倘若將警力分散，必致每一警區警員都被匪徒逐一喫掉。這一觀點，居然被余先生採納，他就召我去民政廳參加江蘇省警官學校籌備工作，經過半年，又教我到淮陰、徐州招生，分警官正科一班，現任警官補習班一班、警士班三班編為三個中隊，聘政校大隊長吳某為大隊長，以馬

占山部下打游擊的軍官為教務主任，任命我當一位教官，教行政法、違警罰法及統計學三門課程。開學以後，余先生兼任校長。教務主任是一位老粗，蔣委員長為給予東北淪陷後忠貞同志生活，分發江蘇省分別安置，而不得不予任用的軍人，實際上要我多負教務責任，經過三年共計訓練二千餘人，分別在崑山、無錫、江寧三縣集中任用，將舊的員警一律裁遣，開始試辦警管區制，民國二十五年余先生徵求我的意見，派我為江寧自治實驗縣警察局長，我當即表示婉謝，他問為何不去江寧縣工作？我的答覆是我不想做官，待三、五年後打算訓練數千警官，分佈各縣，要掌握全省警力，作為將來政治資本，他看我有此雄心也就不勉強我去任江寧縣自治實驗縣警察局長，並且接受我的意見，推薦另一教官，是雲南籍同學秦潮臣兄去接任江寧縣工作。在崑山、無錫、江寧三縣員警如發生問題，余先生總是派我去調查處理，我每到這三個縣去，各局長員警都意識到我是代表廳長前來公幹的。

民國二十六年七七事變爆發，跟着上海於一個月後戰事更加劇烈，警官學校暫時停辦，省政府所在地的鎮江，也岌岌可危，奉令暫遷揚州辦公，余先生派我任船舶大隊長負責收容前線各縣撤退員警的任務。這時余先生接獲情報說崑山縣警局員警無故撤退，街上看不到警察站崗，余先生又派我前往調查。我乘火車東行，一列火車中連我祇有兩位旅客。抵達蘇州火車已不能前駛，祇好在蘇州下車，向吳縣警察局借一部消防指揮車，加以偽裝再向前線進發。抵達崑山後，果然不見警察站崗。經詢問後始知警局已遷到水上辦公，原來站崗的警士多被軍隊拉走，補充缺額。局長呈准縣長許可，警士一律換上軍裝，照常站崗，避免軍隊再有強拉警士的情事發生。我明白真象後，找到警局局長召集全體員警簽名，表示未奉到命令，絕不撤退。我取得他們這項保證趕回向余先生覆命。余先生看我匆匆去來達成任務，也了解崑山權宜措施適當，深為滿意。在這件事發生以後不到一星期，省政府奉命改組，由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將軍兼任省府主席，韓德勤接任民政廳長，蒙余先生深夜召見，問我願去？願留？我的答覆「我在揚州天寧寺收容前線撤退的員警八千餘人械彈無算，願組織軍隊在蘇皖交

界處，領導軍隊打游擊，請余先生報告陳主席果夫先生轉報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給我一個軍職名義，我就可以不走。」余先生認為不妥，命我即刻將員警械彈造冊移交保安處長李守維接管，以免顧司令長官對陳主席發生誤會，當即遵辦。第二天早晨余先生隨陳主席乘汽車逕往安慶，遺留下一艘長江巡邏艦，給劉覺民、高登海及我等六個同事撤退之用，並囑我移交之後，在南京封鎖長江之前趕到安慶會合，追我們到達安慶時，蕪湖已在前一夜失守，南京跟着淪陷。日軍進軍之速，真出我們意料之外。而余先生已去漢口，無已，去訪問民政廳長端木愷先生，端木廳長留我和高登海任前線縣長，我們認為毫無準備，對前線地方情形也不熟悉，婉謝任命。端木廳長給我們買了船票送我們前往漢口，我們立將一艘長江巡邏艦移交安徽民政廳接管，從此就過着流亡生活。

重慶避難蘭州服務

民國二十六年冬，我到了漢口即聽說余太師母逝世的消息，忙着去幫助料理太師母的喪事，因得湖北省政府主席何雪竹先生大力協助，獲得停靈地方，和漢口市黨部袁雍兄代覓墳地，在一星期內草率安葬於漢陽墓地。喪事完畢後，余先生見到江蘇警界舊屬與學生紛紛集漢口謀事，就介紹我去長沙見民政廳長胡次威先生，安置這批流亡警官。胡先生發表我為警政股股長，先命我到各地視察警政，遇有缺額即將這批警官一一予以安置。我到了零陵，正巧遇到行政督察專員姚雪懷先生，他原任江蘇蕭縣縣長，是余先生所

賞識的部屬。晤談之後，他亟願引用我帶來的警官，以管理廣西官兵傷患收容所。廣西出兵作戰的軍隊很多，但傷患官兵不准再回廣西境內，一方面恐這些傷兵擾亂後方秩序，影響士氣；一方面廣西財政支絀，實在無錢療養傷兵。他們逗留湖南邊界一樣的擾亂社會秩序，姚專員不得不設收容所予以暫時安養。這些傷患很不容易應付，姚專員引用江蘇流亡警官管理收容所，正得其所哉。他們不計待遇，任勞任怨善意的和傷患官兵相處，同甘共苦，深得姚專員的嘉許。同時姚專員也有意報答余先生對他的知遇之恩。

這時湖南省政府主席是張治中將軍，他是小入得志，自命不凡，文人更不在他的眼下，他制訂的文官制服，褲子像西裝（布質），上衣是中國對襟小褂，中間扣一排打結的鈕扣，穿起來簡直像一個轎夫。他每天日間睡覺，夜間開始辦公，省府會議總在夜間十二時舉行，常常開到天亮才散會，各位廳長日間仍須會客辦公，都感到疲乏，加之他的傲慢態度，各位廳長都受不了。胡次威算是最乖巧的人，也忍受不住。尤其教育廳長朱經農先生以學者從政，更看不慣這種官場怪象，他們相繼求去。中央對張治中信任甚專，不知就裏，擬派余先生來接替胡次威任民政廳長，余先生生於某夜潛來長沙，召見幾位湖南幹部，聽聽他們的意見。這些人多少有攀附的不正當意念，希望余先生來湘就任，而我獨持異議，認為胡先生和張主席相處不能融洽，以余先生的耿介性格更受不了，我勸余先生不必接受這項任務，他就悄悄離去仍回漢口。此後中央派陶履謙先生來

接胡先生的工作，而胡先生則調任四川省民政廳長。不久武漢失守，長沙天天遭敵軍飛機地毯式轟炸，而我的妻子帶了一子一女，冒險趕來長沙，我隨即辭職往重慶避難，計在長沙停留六個月，對警政並無一點與革。到了重慶，施奎齡先生奉命任甘肅民政廳長，正多方羅致科長秘書人才，施先生原任江蘇鹽城區行政督察專員，是陳果夫、余井塘兩先生部屬，余先生推薦我去工作，施先生便一口同意，我就摒擋一切，把妻子兒女安頓在四川長壽兩位叔父家中，獨自循川陝公路、西蘭公路直奔蘭州。蘭州在地勢上是全國的中心，也是大後方西北重鎮，此去抱着很大希望，展佈我的才能。經過兩月行程才到蘭州，在未見到施先生前，他已發表我為第一科科長，主管全省縣政的考核工作，隨即奉命視察臨洮等八縣及卓尼設治局地方行政。

在蘭州有一位同班同學曹啓文兄任臨時參議會副議長，據他說，甘肅全省祇有八個大學畢業生，他畢業後即蒙于右任元老推薦，任肅州行政督察專員，外省來的大學畢業生都可能被政府重用，鼓勵我多努力為建設西北貢獻才智。那曉得我走了一圈之後，發現甘肅教育落後。一個小學畢業生就有人向家長報喜，貼上報條「捷報貴府××少爺畢業××國民小學」，中學畢業生就成了地方紳士，如要做官隨時有人聘為縣政府科長或區長。

甘肅省級縣級都沒有財政制度。因為歷次回亂，各縣魚鱗冊都被焚燬，也沒有辦過土地陳報，因此徵收田賦沒有根據，人民的土地所有權也

模糊不清。政府的支出，悉由區、鄉、鎮層層分攤，縣政府需要十萬，區公所就加倍分攤，經過各鄉、鎮、保、甲多層攤派，可能人民真正負擔數十萬乃至百萬，擾民之深，莫此為甚。

其次，回民講求衛生，二十年人口增加一倍，漢民多半吸食鴉片體弱而懶惰，常被回民欺侮。如果一個鄉村回民多於漢民，回民就起來驅逐漢民出境。因為回民人口倍增需用田地迫切，而漢民原有土地又沒有憑證，有了糾紛就無法申訴，祇有互相械鬥了。

財政為庶政之母，人才為建設必備的要件，甘肅省人才錢財兩者俱缺，地方行政很難下手改革，在朱主席紹良先生巡視時認為臨洮縣長不能稱職，當時指明要我代理縣長，待他回省再辦公文正式任用。我即時答覆，陳明上述人才與財政實況，任何人也無法辦好行政，表示婉謝。朱主席不得已派當地行政督察專員兼任臨洮縣長，暫時解決了問題。

到了漳縣奉命查勘與臨潭兩縣爭界事件，原來在軍閥時代軍人各有防區，有的防區禁種鴉片，有的防區對種煙則不予干涉；漳縣屬於前者，臨潭屬於後者，臨潭人民為擴充種煙區域，偷偷的將界石向漳縣搬移，以便種植鴉片。漳縣訴請政府解決，雙方各執一詞，我實地勘察並了解實情後，找出隴西州誌中縣界說明，才獲解決。

最後到了卓尼設治局，調查洮河上游保安司令被人謀殺事件。所謂保安司令者是東北藏酋長的別稱，省政府為安撫酋長，賦予他這一個美好的頭銜。另設設治局於邊界，監視酋長舉動，防止

他有叛離的企圖。卓尼是藏語譯音，原意就是森林。東北藏地區，東西跑馬行程是六天，南北跑馬行程四天，相當於江蘇半個省的疆域。中國並無地圖可資參閱，祇有英國傳教士繪有英文地圖，存在省政府圖書館可供佐證。酋長是世襲的，他被仇人暗殺時，其子才十歲，隨母避難於喇嘛廟，我去訪問他，他穿著保安司令軍裝，由其生母代述酋長被殺經過，證諸設治局局長的言詞亦復相同，當即會同設治局長報請省政府加封其子繼承保安司令，他即傳令（烏拉）藏民八千人各帶馬匹武器請我閱兵。並送我一牛車皮裘，當即拒收，說明現在政府是開明的政府，不可有此跡近賄賂的行為。

關於藏民的民情風俗，在此附帶記述如下：藏民（指東北藏）寓兵於農，少數過着游牧生活，他們習於騎射，所用步槍，槍端插有枋杈形鐵柄，射擊時，將枋杈倒插在馬頸上當作支架，騎者伏在馬背上舉槍射擊，百發百中，他們騎在馬上精神抖擻，正如精練的騎兵步隊；但是下了馬則步履遲鈍，因為久騎馬背，兩腿下肢向內彎曲成了弧狀，彳亍彳亍，就不能跑步了。他們身着沒面皮裘，腰間繫一長帶，胸部鼓出一個大口袋，所攜帶的乾糧、酒瓶都藏在這大口袋裡隨時取出食用。游牧人民夜間就睡在牛背上，把腰帶解開放下皮裘，覆蓋腳部呼呼入睡，他們喂的多屬糶杞酥油。

藏民生下男兒多數要當喇嘛，祇能留一個男孩在家裡傳種接代。因此女子過剩，很難出嫁配成佳偶。成年的少女招待一個男士回家同居，父

母每每引以為榮，在這普遍難交的情形之下，花柳病非常流行，鄉間任何西藥都買不到，惟有「六〇六」、「九一四」針劑到處有售，可見花柳病泛濫到什麼程度了。

東北藏處於崑山高原，終年積雪氣候嚴寒，當地出產以皮裘、熊掌、鹿脯、金沙為多，所缺的是布匹、鹽巴，漢人往往欺負藏民，以貨易貨，喫虧的總是藏民。我曾建議政府成立貿易公司，與藏民舉行公平交易，可惜在抗戰正激烈的時期，政府籌餉練兵已是羅掘俱窮，那有這筆經費經營這些小事。

我走了兩個多月回到民政廳寫了視察報告，並作許多建議，始終未蒙廳長召見，究竟他看了報告沒有？不得而知。在廳裏待了半年，沒看過一件施政計劃，也沒召開過一次廳務會議，反觀後院的教育廳在鄭廳長通和先生領導之下幹得有声有色，成績昭著，我看施廳長終日鬼混，甘肅庶政的革新毫無希望，已萌去意，當將以上情形寫了詳細報告給余井塘先生。余先生滙了一筆旅費給我，並覆函囑我趕快回渝，可是這封信和旅費都被施廳長沒收了。不久以後呂若謙兄有信給我，問我何以不回重慶，我才恍然大悟，我就責問主任秘書龔心齋兄，才證實余先生確實有信來，施廳長正到重慶出席什麼會議，臨時時曾關照龔心齋等他會晤余先生後，再來決定我的去留。我不待施廳長回甘，毅然的下辭職書，絕絕而去，我一生遇到這位長官真是不幸之至。當時有兩位同學還在那裡候差謀得縣長一職，最後都不得好的下場，一位落荒而逃，一位是獲遷治罪。

我回到重慶，余先生正回政大母校任畢業生指導部主任辦「服務」月刊，便利畢業同學互相交換服務經驗，要我任指導部幹事，處理同學與余先生來往函件，從此就未再離余先生左右，也結束我一年半的流浪生活。

追隨余師井塘工作

余井塘先生在民國十六年任黨校教授，十八年又任過政校教務主任，前幾期同學都是他的學生，在他任組織部秘書以及二十三年任江蘇民政廳長時，這些同學又是他的黨政幹部，因此師生關係非常親切。這次又同政校任畢業生指導工作，師生的親和力更為加強。他號召服務全國的同學努力本崗位工作，爭取抗戰勝利，發生很大的作用。每天收到同學的報告數十件，都要一一作覆，我的工作也倍加沉重，他更選些有普遍性的覆函，刊在服務月刊，傳達全體畢業同學閱讀。他勉勵同學的要旨是深入民間探求民隱，解救民困，擴大大公、各盡所能。

二十八年秋余先生奉命任教育部常務次長，要我追隨他任薦任秘書，部長陳立夫先生兼任社會部長，工作很繁。除主持教育部會議外，很少到部。政務次長顧毓琇先生以學人身份從政，他缺少行政經驗不問政事，多半出外旅行講演。教育部政務事務都落在余先生肩上，平日接見賓客、批閱公文、協調各司政見，日無暇晷。他惟一的嗜好就是抽抽香煙。有一天，逢星期日他仍在批閱公文，忽然叫沈進之工友抱了十幾種香煙送給我，說次長戒煙了。我就去問余先生：「余

先生既然決心戒煙，為何讓我繼續抽煙？」他答覆得很妙：「任秘書的工作無定時，大半多是抽煙的，我們在組織部時的三位秘書張道藩、洪蘭友和我都不斷抽煙，你如有決心也可以戒煙。」可是我始終沒有戒煙的決心，他也未嘗對我加以責備。秘書中有兩位簡任、三位薦任，他們都是有教育經驗的人才，惟有我懂得一點法律知識，尤其對行政法稍有認識。常常為審閱公文，發生法律上不同的見解，帶來余先生不少的煩惱，余先生認為祇要我的動機是善良的，總是予我支持。有一次，廣西省為了沒收私家祠堂財產擴充教育經費的再訴願案，由國民教育司審理主稿，對當事人予以駁覆，維持省教育廳原決定。在主管教育者認為沒收私人財產與辦教育是正當的措施。我認為這是侵奪私人財產權屬不當行為，就動筆改稿。以致引起國民教育司、參事室、秘書室各位主管的不滿。大家向余先生申訴，說我擅權改他們的文稿，當時余先生查問各部都有訴願審理委員會，而教育部獨無，在其他各部都由參事主稿請訴願委員會議定奪，余先生乃召集參事室、國民教育司及主任秘書會商處理，要我說明改稿理由，我就侃侃道出：「在廣西未受中央節制以前藐視中央，每每不遵守國法，為所欲為，而今廣西省政歸附中央走上正軌，就要服從中央法律，為興辦教育而侵害人民權益，犯了本位主義的錯誤，應予糾正。」余先生隨即查閱這類案件多不多，有誰曾學習法律，能承辦這類案件，大家啞口無言，有一位參事說出真話「這類案件多達百件，因為大家都不懂訴願為何事，所以積壓參事室多年，

都未處理，不了了之。」余先生既了解實情，特派政校法律系畢業同學阮華國兄任參事室科長，清理多年積壓的公文，掃除一件黑暗的公案。

抗戰初起時，共產黨認為是擴張勢力最好的機會到來，一面通告全國擁護蔣委員長抗戰到底，改組軍隊為第×集團軍隸屬中央；一面辦抗日大學於延安，不分男女學歷，一律招收，訓練三個月畢業再分派各縣鄉村裏貧民衆，實行清算鬥爭，號召農工革命，擴充地方武力與政府對抗。教育部有鑒於此，將各大學遷移後方，並予擴充，成立一百二十所大專學校，另又創辦國立中學、職業學校、師範學校四十餘所，吸收流亡青年，免受共黨荼毒。教育部疏散所在地重慶青木關，有國立音樂學院、中央大學附屬中學及國民小學與幼稚園，我將家屬遷移青木關，便於子女受良好教育，在這一段時間可算是享受最安定的生活。當時公務員生活最苦，教育部同仁三餐不得一飽，最可憐的，吃飯沒有蔬菜，用醬油沖湯下飯。有一天段錫朋先生因事來部訪問余先生，看到同仁的清苦情形，大為讚嘆，說大家能這樣的堅持下去，才能獲得最後勝利，我們過慣了這樣生活也就安之若素。總務司長蔣志澄先生實在看不過去，代部長作主，以節餘經費買黃豆磨豆漿，在午前分送員工每人一碗，增加一點營養維持健康。大家之所以甘願忍受飢寒，都覺得有美好的前途——抗戰勝利必屬於我，既有這樣的信心，吃這點苦也就算不了什麼了。

何況在前線浴血的將士，比我們更艱難險阻百倍。全國軍民受蔣委員長堅忍百忍以圖成的精神

感召是不可否認的。

民國三十三年，日寇作最後的掙扎，前鋒一直打到獨山，陪都爲之震撼，幸而河南軍隊及時趕到貴陽，日寇知難而退。我們國軍更揚威印緬，美軍在太平洋越島戰爭又節節勝利，日本敗象已露，我們還都祇是時間的早遲罷了。

中央這時準備召開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討論戰後復興大計，調陳果夫先生（不久又調陳立夫先生繼任）爲中央組織部長，余先生爲副部長，余先生要我隨任工作。組織部職員待遇比教育部更苦，職員都沒有宿舍，當時朱驥先先生則由組織部長調任教育部長，他很識大體，知道我到組織部沒有宿舍，仍准我的家屬留住教育部宿舍。朱驥先先生很講究衣著，他在抗戰末期所穿西服褲子也打了補釘，可見軍公教人員喫苦奮鬥是上下一體的。余先生和我一樣，家屬仍然留住教育部宿舍，他同我們一起在飯廳用餐。有一天他出去開會，叫工友替他留一份午餐，而主管伙食團的楊西崑同志堅持不可，說副部長必須到飯廳同大家一齊用餐，余先生回來忍餓，叫楊同志前去問話，他說：「我出外開會總不能頂着鍋出去，你讓我受餓這算是同志愛嗎？」楊同志知慚而退。嗣後才容許余先生開會時事前留一份午餐。

召開代表大會前各省市先選舉出席代表名單，要擺得四平八穩，這是一件很繁雜的工作，稍有不公即遭各方非難。幸而黃宇人同志任中央常委兼任中央團部常務幹事從中協調使團部才智之士都安排在代表之列，大家也認爲組織部做事公平。嗣後大會召開以後，組織部又忙於安排中央

委員候選名單，陳立夫先生、余井塘先生會同陳誠、袁守謙先生等秘密會議多次商定名單，總希望黨團合作，開誠布公，爲國家創造新機，可算是雙方竭誠合作。陳立夫先生更是識其大體處處爲大局着想。可是在臨投票的前夕，一些元老不斷在委員長官邸包圍總裁，另外提出名單，總裁不斷的打電話給陳立夫先生，提出候選人名單，直到深夜，工作同志打算分配選票，印發各位代表，總裁仍有電話吩咐提出新的名單，陳立夫先生回答總裁：「時候不早了，請總裁休息罷，候選人名單如再變更，我們在時間上無法通知各位代表投票了。」第二天早晨已開始投票，總裁又提出一位候選人，這時候已無法通知各位代表，黃宇人同志立即報告總裁，這個同志如未列入名單而不能當選，我獲當選即宣布退讓，達成總裁意願。

投票後當晚在浮圖關大食堂分十組正進行開票，秘書長吳鐵城先生起來叫大家睡覺，現在不必開票計票了，你們等明早總裁宣布當選名單後方得離場。次晨總裁宣布當選名單，某也若干票，某也若干票，都是吳秘書長事前一手算計，呈遞總裁宣讀的。這件事祇有敢作敢爲的吳秘書長可以做得出來。有人說陳立夫包辦中央委員選舉，那是冤枉他的。這次選舉當選中央委員八百餘人，不少年輕人脫穎而出，我的同學周異斌兄也當選了中委，引起我們的老教授經濟學家趙蘭坪先生的不滿……

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對全世界宣布向盟軍各國無條件投降，舉國聞訊，欣喜

若狂，當天蔣委員長乘敞篷汽車在陪都重慶遊行，接受市民歡呼。我回憶八年抗戰的艱難過程，因興奮過度，當天不能成寐。蔣委員長第二天宣布「以德報怨，放棄日本一切賠償，並維持日本天皇制度」，所得戰果就是收復原有版圖及臺灣失土，並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中華民國成爲四強之一。

這時政府忙於受降及復員兩大工作，因爲勝利來得太突然，一切安排事前多未加考慮，各省接收大員當然以在職軍人爲優先，爲防範共產黨的擴張，不得不如此佈署；通都大邑的市長，以及後方省政府主席，多半是××系人物，真正國民黨才智之士並無一人參加接收，這些虎狼搜刮民財無微不至，有所謂五子登科之說：接收漢奸的條子、房子、車子……，因此喪失了政府威信。最使人民失望的是淪陷區爲政府發行的儲備券，幣信良好，而政府大量發行的法幣根本沒有準備金可言，在接收時更大量發行，使通貨惡性膨脹；復規定收復區的儲備券二十元兌法幣一元，等於政府沒收淪陷區人民的財富，使全國人民失望，以致怨聲載道，敢怒而不敢言。民心既然渙散，有不少青年因厭惡政府措施失當，轉而投入共黨陣營。

勝利之後，因爲交通尚未復原，我們留在重慶，政府也未能及時還都，接收大員的穢德穢行消息，不斷的傳到重慶，余井塘先生就糾合梁寒操、賴璉、黃宇人……等熱血同志，發起革新運動座談會，號召全黨同志以「救國必先救黨；服從領袖不能盲從領袖；中央常委須由全體委員票

選，懲治貪污大員宋子文；一切政策以國計民生為依據」為當前要務。一直到三十五年五月五日選都以後，仍繼續擴大這項運動，引起各省熱烈反應。事後所能做到的祇有兩項，一是中央常委不由總裁指定，真正由全體委員票選產生，一是行政院長宋子文的下臺。

在勝利之初，不少政客——民主同盟份子附和共產黨的叫囂，要選政於民，於是政府召開政治協商會議，擬定憲法草案，預定選都後召開制憲國民大會，連各黨各派代表名額都協商議妥。直至三十五年十一月召開制憲會議時，共產黨又拒絕參加與會，他們仍從事顛覆政府活動，公然與兵叛亂。其他人士照常開會，費了一個半月時間制訂現行的憲法公布於世。在制訂過程中，國民黨當然組織了黨團，從事連繫工作並說服友黨一致支持通過。其時我任黨團幹事之一，日夜住在辦公室工作，夜間在我床邊設了兩具電話，傳達黨團命令，接受黨員代表的報告，每天早晨向總幹事余先生作一彙報，如此辛苦了四十九天，最後領了總裁一頓慰勞晚餐，余先生也准我在家休假三天。

黨團組織以吳鐵城、陳誠、陳立夫三位先生為指導委員，余先生為總幹事，在組織成立後，余先生要我準備兩份黨團經費預算，一個是三億元，一個是四億元，送請吳秘書長兼指導委員批示，吳先生看了預算後，隨即召集一位秘書、一位會計處長當面指示，制憲是黨多年革命的目標，也是國家百年大計，祇要圓滿達成任務，花多少經費在所不計，這件預算書是不必要的，要

我轉告余先生，用多少算多少，不要被預算所拘束，並對這位秘書和會計處長說：「以後憑余先生的取款條來領款，要多少便給多少，不准打一點折扣。」吳先生胸襟的豁達，魄力的雄渾，誠令我感佩不已。

黨團第一次開黨員代表大會，舉行假投票，選舉主席團人選，余先生對大家宣告明天開第一次大會就照這名單投票，以示本黨的民主作風，而且信誓旦旦絕不更改。那知總裁看了名單要加某一位要人列入主席團之一，三位指導委員原擬遵照總裁指示辦理，可是余先生堅持不能接受，他說第一次黨員代表大會所決定事項就不能貫徹實施，今後將如何取信於各位黨員代表，他們又怎能接受黨團的指揮。他做事是一向遵守原則的，當即表示：「我寧願辭去總幹事，也不能接受這一指示」，當時弄得我很僵，三位指導委員認為他的話確有道理，而又不讓他辭去黨團總幹事。最後陳誠想出一個辦法，由他負責將主席團候選人名單中最末一位汪女士（青年團同志）退讓。一場爭執才告結束。

在制憲大會第一次會議討論憲章草案，第一條「中華民國基於三民主義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國」時，傅斯年代表即表示反對，他說：「根據美國立國宣言有『The Government is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這一句話，譯成中文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而不是指的國家，三民主義的內涵已有民有、民治、民享的意義，可以省去這六個字逕改為『中華民國基於三民主義為民主共和國』好

了。」可是青年黨領袖陳啓天起來反對；表示這草案經過政治協商會議議定的，我們在討論第一條草案時就推翻原意，以下各條隨之改變，各黨各派也可以提出更多的意見，使政治協商會議的結果根本不能貫徹了，以期以為不可。傅斯年是敢言直言的耿介之士，他所持反對理由是絕對正確的，除了陳啓天之外，沒有不贊成的，最後黨團組織運用胡適先生出來說話：「我們為委曲求全，謀各黨各派的支持，最好對草案原文以不改為是。」一場舌戰才告終止。其後繼續逐條討論，於三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很順利的通過中華民國憲法，於三十六年一月一日由國民政府公布，並於三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施行。（未完待續）

敬告留學生家長

慰藉 貴子女異鄉作客寂寞的最佳禮品，便是為他們訂份「中外雜誌」。請將貴子女在國外詳細地址填妥，連同全年十二期訂費新台幣壹仟貳佰元，交郵政劃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立即按址按期寄書。